

滬西扶輪社--徐國懋

由船民子弟成長起來的博士銀行家

劉敬恒（中華扶輪史研究員）2015年11月1日



具有博士學歷的銀行家，在中國早期的現代銀行業的中，徐國懋是第一位。他，是由船民子弟成長起來的一位中國現代銀行家。

徐國懋是滬西扶輪社(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的現職社員。可惜滬西扶輪社的生命很短暫，它在1948年組織，11月16日加盟國際扶輪，證書編號#7097，然而在1952年1月24日被終止會籍。徐國懋是該社解散前的最後22名現職社員之一。人們認為，促使國際扶輪終止會員資格最直接的原因，是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6月-1953年7月）。這場戰爭使美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政治和社會環境肯定不利於中國的扶輪社加入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國際扶輪。



徐國懋1906年8月8日出生在大清國江蘇省鎮江府新河街，有兄弟姐妹八人，一大家全靠父親徐瑞傑操持的一條駁船維持生計。儘管生活負擔很重，但他的父親還是在他11歲的時候，把他送入當時由鎮江基督教會辦的潤州中學讀書。不到三年，他就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市金陵中學。初三時，他開始勤工儉學，每天下午課後為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醫學院英文打字。在暑假期間也不回家，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以減輕家裡負擔。

17歲時，徐國懋考入金陵大學文學系，繼續勤工儉學。除了兼職英文打字以外，從大二時兼教南京市鍾英中學高二英語。1926年，有教會創辦的四所著名大學，即金陵大學、滬江大學(Shanghai University)、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聯合進行英語辯論大賽，徐國懋代表金陵大學參賽獲得冠軍，在學校嶄露頭角。1927年，在北伐軍勢如破竹接近江浙時，外籍教授紛紛撤離。金陵大學的大一英語沒有老師授課，校長陳裕光博士(南京扶輪社社員)請他以大四在校生的身份教課，並親自來坐堂聽課壓陣。誰知同學們反應很好，從此獨立授課，直到1928年大學畢業，得文學士學位後留校任教。

1929 年，他在同校教授貝德士幫助下自籌二千美元，赴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學校規定，博士生必須攻讀兩門外語。他廢寢忘食，僅用六個月時間，就拿下了德語、法語課程。能夠閱讀法文、德文報刊，並考試合格。1932 年，他以《關於中國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問題》為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前，任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中文秘書。

1932 年回國後，徐國懋任金陵女子大學(Ginling College)國際關係教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英文教授。1934 年轉入全國經濟委員會任秘書、專員室主任，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事宜。

1936 年，正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負責國際技術合作業務的徐國懋，接受金城銀行(Kincheng Bank)董事長周作民的邀請，出任金城銀行漢口分行副經理，開始了他作為中國現代銀行家的人生跋涉。金城銀行是當時中國一家著名的私人銀行，以扶助農工、扶助實業、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為宗旨；綜合實力迅速發展，分支機構達到 65 處，存款餘額 2 億多元。但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業務發展受到重創，處於分散經營狀態。1938 年在上海金城銀行總處辦公，兼菲律賓友聯投資公司經理。

1941 年，在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候，他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銀行重慶管理區副經理和重慶分行經理。重慶分行是金城銀行內地位僅次於上海分行的重要機構，金城銀行不惜血本支援的許多企業，此時都在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為了保證資產不被日寇掠奪，上海分行已有周作民冒著成為漢奸的風險親自坐鎮掌控。在當時通信、交通全部中斷的情況下，周作民任命徐國懋主持重慶分行，可見對他的信任和看重。徐國懋不辱使命，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銀行重慶分行全力以赴，支援國家戰略大後方建設。在這一時期，徐國懋出任了許多重要企業的職務，如民生實業公司董事、渝鑫鋼鐵廠董事、重慶纜車公司董事、大成酒精廠常務董事。他利用自己留學美國和長期在教會學習工作的便利條件，廣泛聯繫國際友人參與中國的抗戰；兼任了美國教會援華委員會主席、全國大學生救濟委員會主席和金陵大學、大夏大學(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福建協和大學(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校董；吸收了美國援華機構的大量存款，支援國家的戰略後方建設。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組織投資 90 萬元鉅資，支持著名人士楊度之子楊公庶開辦了大成酒精廠。生產出大量酒精，代替石油。成為大後方急需的汽車燃料，有力支持了抗戰。抗戰勝利後，徐國懋把在重慶分行期間積累的二百多萬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銀行上海分行行長。

1945 年抗戰勝利後，徐國懋任上海金城銀行總行經理，兼新裕紗廠、太平洋保險公司常務董事。又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常務理事、上海市臨時參議員及第一屆參議員、上海市銀行公會常務理事。

1949 年徐國懋任金城銀行總經理。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上海前夕，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脅迫徐國懋去臺灣，而他巧妙的攜全家去了英國殖民地香港。到香港後，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又專門派人到香港請他到臺灣，遭到他的拒絕。當年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派章士釗、黃炎培到香港動員金融界人士回國參加新中國經濟建設，徐國懋響應號召在 11 月回到北京。

經過徐國懋說服爭取，1950年8月，在中國銀行界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著名銀行家、他的老上司、金城銀行創始人、董事長周作民回到了北京。周作民是中國著名的「北四行」--即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的領袖人物，於是這幾家銀行成立了聯合管理處，由周作民任董事長、徐國懋任管理處副主任，並在不久後完成了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後，徐國懋被派到上海人民銀行任研究室主任。他不甘拿錢不做事，組織大家編成了百萬字的《上海錢莊史料》和《金城銀行史料》。直到今天，這兩部著作都是經濟界公認的金融史權威專著，他也因此成為新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開拓者。1957年後，徐國懋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上海市委員會專職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66年5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左派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徐國懋和他的家人受盡折磨、劫難。但在197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後，他無怨無悔的投入國家建設，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同時擔任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常務董事、杭州浙江投資信託公司董事、上海愛建金融公司董事、上海市金融學會名譽會長、上海中華造船廠顧問、全國紅十字會執行理事、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會長、金陵大學校友會副會長等職。

1981年後，他三資自費出國，周遊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港澳地區，遍會親朋好友，宣傳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為吸引外資和祖國統一出力。1994年8月，徐國懋因心臟病發作在上海逝世，享年88歲。徐國懋除有《八五自述》一書面世外，還有許多回憶文章散見於各種書刊雜誌。

「老政協」徐國懋的五個「不」

宋立桐《聯合時報》

1990年國慶前夕，徐國懋先生84歲高齡時，在上海泰安路寓所寫下一段話，令人肅然起敬：

『現在我常想，政府在各方面給我的待遇是優厚的，但我卻並沒有為國家做多少事情。比之終年辛勞，為國家增加財富的工人、農民，比之終年辛勞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教師、商業工作者、科研人員，我實在深感慚愧。最近讀到白居易詩：「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這幾句真可謂我內心的寫照。我已年邁，報國之日無多，希望我的子孫，要以各自的才能，為繁榮祖國、振興中華，作出應有的貢獻！』

寫下這段話第六年，國懋先生安然遠逝，而他那克己憫人、公忠體國的仁者之風，卻永世長留。



1980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舉行紀念上海解放31周年座談會，這是部分參會者的合影。
趙祖康（前排左三）、武和軒（前排左四）、劉昌義（前排左二）、徐國懋（三排左三）。



徐國懋在會上發言

歲月如流，沖不去色彩斑斕的記憶；往事如煙，消不盡參政議事的真情、深情、激情……

且說上海解放前後，市政府位於江西中路漢口路西南角。離此不遠，有一座高聳入雲的金城銀行大樓。這是一幢經歷時代風雨的銀灰色現代建築。天天自駕小汽車來此運籌帷幄的，是風度翩翩的總經理徐國懋先生。後來他當了三十多年政協委員。

徐國懋是我國金融界資深學者、經營管理專家，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以原金城銀行總經理身份，在政協和民革擔任不少領導職務，在經濟、工商、體育、宗教、社會救濟團體中也兼了許多頭銜。這位「老政協」、「老民革」以交遊廣泛、才思敏銳、曠達豪爽、與時俱進的仁者之風，給後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徐國懋的興趣愛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歡打網球、打橋牌，會跳舞、游泳，愛旅遊、攝影、聊天、開汽車……幾乎樣樣都懂，什麼都會。但筆者最佩服的，還是他立身處世和參政議政中的五個「不」。

一、不做「不仁不義」的事情

徐國懋是江蘇鎮江人，船工的兒子。「滿眼風光北固樓」的鄉情文化，敦促他勤修苦讀；「六朝勝地，十代名都」的山山水水，滋潤他淳厚坦蕩的心懷。從鎮江到南京，憑助學金、獎學金完成金陵中學、金陵大學學業後，22歲的徐國懋留校任英文講師，這為他後來赴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研讀政治學專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他在約翰霍金斯獲得博士學位。期間的學雜費、生活費，均以兼任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中文秘書和業餘打字所得來維持。他的博士論文《關於在中國的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問題》，彰顯了對祖國強盛的期盼與自信。那年他才26歲，血氣方剛，國感家貧。他到美國第二年，加入了留美中國學生的互助團體——仁社。

仁社的宗旨是實踐「仁者愛人」的理念，團結在美國留學的優秀青年，以勤奮學習所積之長報效祖邦。品學兼優的徐國懋為人處世講仁義禮智信，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核心是以仁為本。他深得仁社兄弟推崇，當了兩年總社社長，仁社成員最多時近一千人，遍佈世界各地，絕大多數回國後都在政府機關和各重要建設部門任職。這也為他日後的上層交往，展現了一幅可供縱橫馳騁的藍圖。有一年河南遭水災，徐國懋和他的仁社弟子一道，以仁者之心，在紐約發起組織一場國樂義演，門票收入悉數賑災。他回國後在漢口任事，正處於抗戰艱難時日，曾親自接待和周濟過許多過往的仁社親友難胞。改革開放後，他多次去美國、香港，有時就是在仁社弟子的家中落腳的。

徐國懋的仁，同國家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年，吳貽芳校長函邀徐國懋回金陵任教。他義無反顧，肩負著「為國育才」的大願歸來。之後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英文教授，並開始接觸政界名流，為當時剛成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秦汾相中，轉而擔任該會薦任秘書兼專員室主任。因在與中外專家聯絡協調中初露鋒芒，又被大銀行家、金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周作民延攬。由此，徐國懋開始涉足金融界。「七七」事變後，他作為「金城」管理層的青年才俊，駐漢口，屯重慶，結識了民族實業家范旭東、盧作孚，與他們聯手共克時艱，闖出了金融募資與實業開發相結合的新路，為救亡圖存和民族振興辦了不少實事，最終歷練成周作民之後的金城銀行總經理，成了「事理通達，心氣平和」的聞人。

徐國懋的仁義之心，是他後來去香港又迅速返回大陸的思想基礎和重要條件。當章士釗、黃紹竑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按周恩來總理之意到香港聯絡各路精英返回大陸參加建設時，徐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主要基於兩點，他決定北上。一，周作民是金城銀行開山鼻祖，提攜徐國懋有知遇之恩，而周作民這時又滲著淚花向他表示：「金城辦了幾十年，我們不能讓它夭折，我希望你回去能把行務抓起來。」他不能忘恩負義。二，章、黃勸徐時，金城銀行正在香港開董事會，認為大陸各地分行在內戰烽煙尚未止息時更需有人照料。他不能泯滅急公好義的敬業精神。徐國懋還想到：劉鴻生（現代中國著名的民族資本家、實業家）的二公子劉念義剛從上海乘解放後「首航香港」的輪船來，對他說的「共產黨解放軍紀律嚴明、作風優良，是仁義之師」那席話、那些事……這一切，都使徐國懋下定了返回大陸的決心，並向周作民承諾。幾乎同時，先期逃往臺灣的陳誠也在爭取人，派了心腹從臺灣到香港，發帖子宴請金融界精英，以圖拉攏。徐國懋顧念到對「金城」、對周作民的公誼私情，認為「主意既定，不能動搖，不可失信」，便婉謝了臺灣方面的宴請，從而作出了走向光明、走向人民的行動抉擇。

徐國懋的仁者心腸，貫穿在他的一生。他主張，要像愛自己一樣愛國家、愛民族、愛朋友、愛鄰居。上海民革、民建及工商聯的老一輩人士都知道：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徐國懋沒有為了使自己能「脫身」而去歪曲事實，違心出賣好人。「四人幫」粉碎後，他為許多共過事的在「文革」中被誣陷的朋友，及時提出了平反建議，為安置不公的人，申訴過他們本人不想講的心裡話。徐國懋認為：這就是循名責實、仗義秉仁。在這方面說一句話，要比在各種場合講許多其它的空話、廢話、門面話有用得多。

二、不開莽夫之勇式的「大炮」

徐國懋自謂，他解放前曾經「糊裡糊塗當過國民黨當局的上海市參議員，還花了幾十桌酒席錢，參加所謂競選。至於為什麼『競』，為什麼『參』，『參』了什麼『議』，自己也說不清」，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當的是人民政協的委員，是人民的上海市政協常委。這是有著重大的政治責任的。」「首先，我們的責任是不能以莽夫之勇亂放炮。說話、辦事、想問題，都要言之有據，言之成理，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這就是他作為政協委員對自己的基本要求和一貫態度。

改革開放初期有段時間，北京出現「西單牆」。他說，這實際上是「文革」回潮，我們現在不需要這種人云亦云的「炮筒子」和別有用心之徒來搞什麼「大民主」。有話可以說，有意見可以提，但民主不是以訛傳訛亂放炮，更不能容許蠱惑人心反體制。針對「黨大，還是法大」的議題，徐國懋明確表示：「從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來說，黨大；從法律制定後黨也要遵守來說，法大。這是由我們國家的國體、政體決定的。國家領導體制需要也可以通過改革來完善、加強，但絕不能用任何餽主意來背離和削弱。」這說明，徐國懋這位金融家和政治學教授的功底，確實不是可以隨便讓人小覷的。這正是他長時間在政協參政議政不放「大炮」、堅守底線而真能體現深厚學養和政治分量的一個重要因由。

1983年，上海市政協舉辦了一次有關祖國統一和涉台政策圖片實物展覽。其中，有不少內容涉及國民黨軍政界人士。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張承宗事先關照策劃人員「務必請民革的同志先看看，聽聽他們的意見」。

一天，在上海的原國民黨軍政界人士劉昌義、武和軒、宋瑞珂、徐國懋等接受邀請到預展現場觀看。劉昌義要求將涉及到他的「投誠」二字改為「起義」；宋瑞珂要求將「師長」改為「軍長」（理由是他「領導的是整編師，實際實質都是軍」）；武和軒看到孫科和藍妮的圖片捧著拐杖大吼：「一個婊子！怎麼好拿來展覽。」只有徐國懋，佇立不動，也不吭聲。事後，個別走訪。他在泰安路寓所，對筆者說了以下一席話：

「我們民革幾位同志，所提意見都是不錯的。他們不是為了出風頭，爭體面，而是為了把事實搞准，把表述搞貼切，把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宣傳好。武和老生氣，不能怪他，他和我一樣，都是仗義直言的人。據我所知，藍妮上展覽，不止一個人有意見。她是當年上海灘的「交際花」，是孫科的外室，不是原配夫人。我到她家吃過飯。那是因為她打著孫科的牌子，帶著孫科寫有『敝眷』的親筆信，向周作民『借錢』，開價是法幣二萬萬，相當於一千兩黃金。領人來『借』了幾次，氣勢洶洶。周怕出事，讓我出面調處。藍妮很厲害，拿了非份之財，臉都不紅一下。對這樣一個人來大陸訪問，要不要當『貴賓』向公眾展覽，我心中無數。今天有機會和你暢談，也是『自家人不說兩家話』了。蕭松啊（按：蕭松是筆者當時常用的筆名），這也是我參政議事一貫做法，就是平心靜氣，商量辦事，守底線，看場合，說真相，顧效果，多想想同一個問題的幾個方面，不開『大炮』不『擺譜』，要同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吻合。你說是不是？」

這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三、不當空談誤國的「清客」

徐國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他夫人是一所中學的優秀教師，「文革」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抄家批鬥，心神俱憊。「四人幫」粉碎後，他從不在政協或黨派的會議上，拿自己受到的委屈吐苦水。他心裡想的，都是關係到「把經濟搞上去」，「把統一戰線這個法寶傳下去」的「形勢發展要求」。他認為「重三倒四地去譴責去訴苦並無大用，要緊的是多為撥亂反正出些實實在在的點子」。這種不當「俗客」不作「清客」的雅致，是難能可貴的。

國老在市政協對台辦（類似今時的市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辦公室）兼職期間，以不做「清客」、「暢言敏行」而受到大家格外尊敬。他曾經問我：「你覺得李立俠這個人怎麼樣？」我說：「他是解放前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財經專家，很有學養，為人正直，做事認真，政協請他參與辦的事，他都能一絲不苟地辦好。他家住在漂陽路，有事都提前半小時到位，李老戴的近視眼鏡像酒盅，深得很呀……」聽到這裡，他放聲大笑。不久，徐國老綜合各方面意見，向統戰部提了一條建議，推薦李立俠為市政協常委。事後他高高興興告訴我：「這是為調整統一戰線內部關係，實事實幹不空談啊！」

在擔任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室主任期間，國老聯絡了一批解放前上海各銀行錢莊的高級職員，以及原國民黨政府財政金融方面的高層管理者，用三年時間，編寫成《上海錢莊史料》。這本「不尚空談」的書，寫的都是親歷親聞，有鼻子有眼，沒添油加醋，詳盡的事實和準確的資料，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他還主持編寫了一本《金城銀行史料》，將「金城」的誕生、發展、公私合營三個時段的史實，包括上海總行、重慶分行、漢口分行投資興辦的附屬企業的籌建運轉情況，

以及協助處理美國援華抗戰提供業務方便的情況，作了完整的紀錄，受到史學界、學術界很高評價。一次他說，寫這本書的動因是：新中國成立後，金融業的未來肯定會有難以限量的發展，把我們經歷過的輝煌和坎坷如實記下來，讓後來者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一條「為國家民族辦金融」的底線，守好人民的錢櫃！

在涉及家庭和個人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徐老總是以全域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實事求是處理。金城銀行合併為公私合營銀行之後，上海各銀行、銀莊的人員剩餘很多，而外省市卻又奇缺。徐國懋協助政府疏散了數以千計的金融人才去全國各地發展。他的嫡親兄弟徐國棠（原金城銀行蘇州分行副經理、徐州分行經理）及夫人潘清婉，就是在他的協商協調下去蘭州人民銀行任職的。

四、 不搞嘩眾取寵的「民粹主義」

徐國懋說過：參政議政不能借機表現自己，尤其不能以「為民請命」的姿態，將一些小事放大，嘩眾取寵。為人民服務不等於「民粹主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早點漲價了，除了大餅、油條、豆漿、粢飯糕，雞毛菜的價格也節節飆升。有的委員提出：這些群眾生活問題呀，我們要協助政府搞好調查。有的委員還提出：對早點「老三件」，價格穩不住就由財政發補貼。

徐國懋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物價民生，固然重要，但政協不宜事無巨細都管；議大餅油條漲價，雖不等於「民粹」，但精力牽扯過多，總不適宜。委員的心志，要集注到大事大局上。民生議題也有大小深淺之分。

有一次，他騎著自行車來政協，車子停在南小樓（今文化俱樂部大樓處），拿出一副大餅油條，邊吃邊和我聊開：「市場經濟有自己的規律，東西漲價了，不能堵，也不要補（貼）。看個究竟再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要找到根。」他喝了一口熱茶繼續說：「重視物價，說明我們對人民利益的關切。但不能就事論事搞貼補，不然會按下葫蘆起了瓢。我現在想得最多的，還是開發浦東、招商引資、把內聯外貿做強做大，做到東西南北、五湖四海、七大洲五大洋……」沒說完，騎著車子一溜煙飛了。我喊他坐一會再走。他老遠地轉身揮手回答：「我要趕回家寫提案……」這時他已七十多歲，簡直像個老頑童！

但是，徐國懋在涉及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要事上，卻是機杼縝密的，涉險也要參與，也要踐行。這有史為證：

「1949年初，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等，響應黨提出的召開新政協會議的號召，準備前往華北解放區參加會議。為此，潘漢年找到周作民，問他能否協助這批人士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銀行出資，在香港租一艘輪船開往天津，擔負起這個任務。為了使這件事得以具體落實，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銀行國外部經理楊培昌與潘漢年聯繫，共同協商，進行周密的安排。二月末，金城銀行花了約四五十萬元港幣，租了一艘『華中號』輪船，運送柳亞子夫婦、葉聖陶夫婦、陳叔通、馬寅初、張綱伯、包達三、鄭振鐸、宋雲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構、劉尊棋、張志讓、沈體蘭、吳全衡等二十七人悄悄離港，勝利到達天津。」（見徐國懋《八五自述》，1992年12月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出版）

徐國懋本是參與其事的，但他以「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高風，從來不提他本人在其中的作用。當輪船在海上破浪航行時，徐國懋正在主持上海金城銀行的工作，國外部的業務活動及開支計畫，都是由他掌握或經他默許的。1989年紀念人民政協成立40周年時，他私下對人說：「柳亞子、葉聖陶乘的輪船上，還裝了一批送給解放區的西藥和生活必需品。我們當時這麼做，也是因為看到了真理和曙光，認定惟有共產黨這支為人民奮鬥的新興力量，才有中國的未來……」

五、不忘自己是「永遠的中國人」

1981年4月，徐國懋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有人認為「他還可以當常委」。但他卻說「管他『長尾短尾』，反正都是『委』，我不當，別人也能當，我的頭銜已經夠多了，重要的是不圖虛名，盡責履職；更重要的是：穩穩實實做一個永遠的中國人。愛國至上！」劉念智（劉鴻生四公子）在旁說：「你老兄學習得不錯嘛，你的品格很像陳雲啊！」徐說：「老弟不可這樣比。他是共產黨員，國家領導人，我不是。不過，他的正直，他的襟懷坦白忠實積極，我們還是可以學的，有這個想學之心，倒是符合共產黨的要求的。」

徐國老的子女、孫子女都在國外事業有成，其中有一個最小的兒子是改革開放後復旦大學的「數學狀元」；有一個孫女已經獲得博士學位。晚輩們常輪番回來看他，他也經常出國或去香港探親訪友。

有一次，1990年吧，國老要我到他家看照片，他捧出兩個大抽屜，照片排得滿滿的，少說也有上千張。

「哈哈，這都是我從1981年開始到現在，3次去美國，9次去香港，3次去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同親戚朋友一塊拍的。」其中，有一群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國老動容說，都是他在金陵大學的女弟子；有開著汽車做V形手勢的大男孩，國老指認說，那是他第二個孩子的孩子；還有一群西裝革履、氣度超群的男士，國老心花怒放說，都是他當年的仁社弟兄。「你知道，我十多次出訪，從不花國家一分錢。」這我是知道的。我說，記得你第一次出去，擔心不會批准，你直接找了張部長。兩天後，你來辦公室告訴我：「張承宗對我說你出去走走，我們完全同意。你在外面見到任何朋友，想說什麼都可以，徹底開放，不必有什麼顧慮……」他聽後反問我：「你記得這麼清楚啊？」我說：「你開心的事，我不會忘記哦！」

國老第二次訪美歸來逢人就說：國外的許多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學，見到我都是涕淚縱橫啊！他們還以為我早就不在人世哩，看我現在滿面紅光，生龍活虎，誰不興高采烈？我個人算什麼？只是滄海一粟；但我又是「黨的政策好」、「國家興旺發達前途無量」的體現者哦！能不自豪麼？！

這次國老還向我透露，他正在寫一本關於自己一生經歷的書，要按張部長說的「想說什麼都可以」那樣去寫，但一定要真實。他說，國家的歷史，改革開放的歷史，個人的歷史，我都歷歷在目。我要通過這本書，用歷史事實告訴子孫晚輩，我們國家及我這一生，走過來很不容易，我現在不想出國定居，是因為根在中國。我要守住這個根。我「忘不了自己是一個永遠的中國人」。

（完）